

检察机关强化刑事检察监督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去年全国刑事案件量为本世纪以来最低

最高法建议办理答复连续三年让代表全部满意
勾画人民法院人大代表为民同心圆

□ 本报记者 杜 洋
□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昕怡

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进一步聚焦深层次、实质性违法问题监督……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创新发展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机制作用，统筹履行刑事检察各项职责，以更高质效法律监督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取得了积极成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在2月5日举行的“强化刑事检察监督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5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87.3万人，批准逮捕60.4万人，同比分别下降15.6%、12.9%；受理审查起诉163.3万人，提起公诉127.2万人，同比分别下降19.6%、13.3%。严重犯罪持续呈下降趋势，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犯罪降幅明显，全国刑事案件量为本世纪以来最低。人民群众安全感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

加强刑事检察基本职能建设

《法治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公诉4.9万人，同比下降10.3%，占起诉总人数的3.9%，持续维持近10年的4%以下较低水平。

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说，近年来，严重暴力犯罪整体呈下降趋势，起诉人数占比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印证了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值得关注的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形态、手段也在不断演变，信息化、隐蔽化、组织性、跨区域性等特征凸显，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毒品犯罪低龄化特征突出，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传统领域与新型领域交织。

工作中，检察机关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极端恶性犯罪，突出惩治杀人抢劫、涉枪涉爆、制毒贩毒及危害生产安全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及时回应关切，安定人心、维护稳定。

在持续深化犯罪治理方面，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规范司法办案防范化解矛盾风险，摒弃“就案办案”思维，特别注重分析严重暴力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监管漏洞和社会治理短板。

为加强刑事检察基本职能建设，最高检去年首次组织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选活动，历时半年共评议案件222件，带动各省(区、市)自行评议案件7700余件，形成了“评议工作与公诉质效双提升、两促进”的良好局面。

同时，最高检建立刑事审判监督异常数据跟踪研判机制，就历年命案证据审查问题牵头研究制定规范性文件，围绕高质效办好毒品案件，依法惩治危险作业犯罪等主题发布6批典型案例，为重罪检察条线办案提供参考。

依法从严惩治涉黑涉恶犯罪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当前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犯罪类型。

苗生明说，去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314件8528人，起诉涉黑涉恶“保护伞”58人。最高检扫黑办共挂牌督办13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并选派专家组现场阅卷，提出指导意见，有力提升案件督办质效。

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说，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加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指导办理，健全完善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机制，以强化法律监督提升扫黑除恶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等举措，依法从严惩治涉黑涉恶犯罪。

检察机关发挥省、市级院对涉黑、涉恶统一把关机制作用，依法改变、追加一批定罪罪名案件，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破网打金”，依法严惩司法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检察机关去年1月至11月共监督公安机关对涉黑涉恶案件立案41件65人，监督撤案4件4人，纠正漏捕62人，纠正遗漏同案犯456人，起诉漏罪228人，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监督文书134件，就涉黑涉恶案件提出刑事抗诉33件。

“2026年，我们将坚持依法从严惩治，保持高压态势，加强挂牌督办案件指导办理，加大司法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查处力度；持续加强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建设，深化落实省级院统一把关制度，切实做到‘不漏、不凑’；持续加强金融放贷、工程建设、市场流通等重点行业、以及农村地区、宗族势力、未成年人等重点地区、重点人群涉黑涉恶犯罪防治工作，坚持露头就打，加强源头预防；进一步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设，推动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扫黑除恶人才库，开展常态化练兵，持续打造过硬检察扫黑铁军。”侯亚辉在答记者问时说。

创新机制推动监督力度升级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的刑事检察工作中，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以来，各刑检厅根据罪名和捕诉一体办案体制分工运转，总体运转顺畅，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办案效率 and 专业化水平，但也出现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基本职能弱化、统筹协调、统一对下指导不足等问题。对此，2024年11月，最高检成立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同时指导32个省级院和部分地区的地市级院成立指导小组。

刑检指导小组运行一年来，不断建立健全制度机制，确保规范化、实质化运行。

——统筹加强“三个管理”，注重共性工作的谋划和总结，下发刑检指导小组工作要点，统一部署推进，完善了最高检四个刑检厅的职能职责及运行机制，分工更加明确、协同更加有力。

——统筹加强刑检基本职能。围绕侦查监督、刑事抗诉、强制措施监督等基本职能，发布指导性案例和规范性文件，强化指导。

——统筹加强重大专项工作。高质效完成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刑执执行监督相关工作。

苗生明表示，在刑检指导小组统筹指导下，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30%和20%左右，保持平稳，无罪判决和撤回起诉的比例下降，质量稳步向好。认罪认罚适用率84%以上，一审服判率96.8%，保持稳定适用，刑事訴訟监督数量的降幅逐步收窄，部分领域的监督力度逐步加大、环比上升，进一步聚焦深层次、实质性违法问题监督，逐步实现强力度、提质效的目标。

“下一步，刑检指导小组将在最高检党组领导下，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加强与省级院刑检指导小组沟通，进一步发挥统筹协调、对下指导作用，推动刑检工作高质量发展。”苗生明说。

本报北京2月5日讯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邀请清小学师生走进该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普法活动。图为该院检察官向小学生讲解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黄丹 摄

□ 本报记者 张昊

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聚焦代表建议办理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总结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并发布7个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的典型案列。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说，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办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469件，较办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361件增长29.9%，代表对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办理和答复连续三年保持全部满意。

更加注重“面对面”沟通

《法治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最高法认真梳理全国人大代表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审议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的意见建议4072条，逐条研究后书面答复，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点对点”推送。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在视察、调研活动中提出或通过来信等渠道反映的各方面意见建议247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每年全国两会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召开承办代表建议交办会，明确要求各部门将建议办理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由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一抓到底。”林文学说，在建议办理中坚持“办前问需，办中互商，办后问效”，确保从代表意见建议中精准把握人民群众期盼、关切，落实好、转化好民意智识。

“最高法始终强调，代表建议办理不仅仅是‘纸面答复’，更重要的是深化与代表的沟通联

络，凝聚共识。”林文学说，最高法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更加注重与代表“面对面”沟通。最高法领导出差期间均专门安排时间走访当地全国人大代表，听取意见建议。办理完毕后对于有价值的工作进展，积极联系代表进一步汇报并听取意见，确保将这项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做实做优，让办理过程成为增进了解、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过程，真正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落到实处。

此外，结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听取关于人民法院海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最高法专题举办人民法院海事审判工作意见建议座谈会，邀请13位全国人大代表共商海事审判工作意见建议落实。

林文学说，最高法自觉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结合起来。在建议办理中，最高法专门邀请代表共同开展有关司法解释研讨、专题调研等活动，积极把代表建议采纳落实到相关司法举措中。

落实转化好民意智

自2023年7月人民法院案例库启动建设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阎建国就一直关心关注建设进展工作。

经过深入调研，并结合实践中使用人民法院案例库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阎建国先后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三次会议期间，提出关于完善人民法院案例库、推动以案释法、解决同案

不同判等行为的建议。《关于强化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奖励优秀案例入库法官的建议》。“最高法对我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办理，积极向我通报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工作情况，答复内容详实有据、全面充分，我从中切实地感受到最高法对代表建议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阎建国说。

阎建国说，人大代表和人民法院同向发力，人民法院邀请社会各界共建人民法院案例库，不少律师以及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等都积极推荐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源头活水”更加丰富多样。

2025年，最高法通过组织视察、上门走访等形式开展联络活动245次，联络全国人大代表629人次，结合代表建议开展的联络工作更加务实，有效搭建起人民法院和代表双向奔赴的连心桥，勾画出人民法院为人民、人大代表为人民的同心圆。

林文学说，最高法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做实沟通联络，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代表法，主动加强与代表联系，将建议办理工作作为与代表共同就社会热点、工作难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过程，真诚凝聚共识，努力做到以高质量的建议办理和答复，让司法公正真有感、能实现、获好评。

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明正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道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会期间提出了《关于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司法保护及综合治理的建议》，希望各方形成合力，

无视法律法规任性“黑飞”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 本报记者 张晨

“万一我坐的那架飞机，正好撞上无人机怎么办？”2025年12月7日，广东中山110接到报警称，有人在清远，中山多次“黑飞”，飞行高度超过8000米——这已是民航客机常规巡航高度。中山警方立即行动，当晚就将涉案嫌疑人李某某抓获。

此前天，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李莹在网络巡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飞”视频。12月9日，嫌疑人朱某某被郴州警方抓捕归案。

“黑飞”两次突破8000米高度

中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周边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珠海金湾三大机场航线交错，机场群之间飞行密度大。

“无人机一旦撞上民航飞机，就是天大的事故。”回忆起调查过程，中山市公安局刑侦侦查支队视频侦查大队大队长方晓亮仍心有余悸。

“当前，民航航班运行量日均近2万架次，珠三角地区日均起降近3000架次。”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处处长吴国栋指出，民航航班和进离场程序在空中构建了“条条大路”，涉案无人机超高“黑飞”事件距离航线只有几百米。

“若无人机‘黑飞’逼近航线，碰撞风险概率将呈几何倍数增长。”吴国栋说。

20岁的李某某此前在中山市沙溪镇一家牛仔制衣厂打工。“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发‘穿云’视频，发红包请他教我破解限高，查了航线，感觉与机场还有距离，以为没事。”李某某用无人机拍摄“穿云”视频后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最开始是炫耀心理，有网友问他怎么做到的，后来就发展成赚了牟利。”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启雨介绍说，朱某某没有发布揽客广告，仅通过视频引流就吸引订全国多地客户。

为追查这些已破解的“隐形威胁”，郴州

□ 本报记者 王春

“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展示无人机能够突破原本的程序设计，飞得更高，还能在限制区域起飞，客户一看便懂。”电话那头，王某某的声音带着一丝懊悔。

这段采访录音，揭开了一条隐匿在社交平台背后的无人机“黑飞”非法产业链。2023年，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侦破的李某某等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案，正是这条非法产业链的典型写照。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日益普及和低空经济逐渐兴起，一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服务”悄然出现——为无人机破解限高，突破禁飞区限制。这已不再只是爱好者之间简单的“技术交流”，而是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甚至构成刑事犯罪的隐秘产业链。

禁飞区上空的异常信号

2023年3月，海曙区公安分局民警在巡查中发现异常：一架无人机在重要场所附近空域频繁出现，其飞行轨迹明显超出合规范围，且飞控系统已被非法修改，禁飞区限制遭到“破解”，这一发现立即引起警方高度警觉。

“我们通过无人机的飞行记录溯源，发现这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有专业人员提供破解服务。”

专案组民警通过调取无人机内飞行记录发现，2025年8月至12月，李某某操控破解后的无人机实施超高“黑飞”20余次，飞行高度多次突破6000米，两次突破8000米。

中山市公安局沙溪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郭睿认为：“嫌疑人在明知存在危险的情况下，仍破解无人机实施超高飞行，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对航线、航路安全造成较大威胁。”

根据中山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无人机中队民警周鹏的经验：“拍‘穿云’视频多数是违规飞行，有些明显是民航高度。”

2025年12月26日，检察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李某某批准逮捕。

破解无人机获利数万元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真高120米以上空域及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场所、涉密单位周边等区域均为管制空域，无论机型大小，必须提前申请获批方可飞行。

帮助李某某破解无人机的人某某最初只是为“穿云”炫耀而请人破解自己的设备，却在过程中自学技术，转而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破解飞行视频吸引客户，以每单几百元的价格提供破解服务。

李莹告诉记者：“朱某某通过境外黑客软件，远程为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程序，累计破解50余台，获利数万元。12月17日，朱某某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刑事拘留。”

“最开始是炫耀心理，有网友问他怎么做到的，后来就发展成赚了牟利。”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启雨介绍说，朱某某没有发布揽客广告，仅通过视频引流就吸引订全国多地客户。

为追查这些已破解的“隐形威胁”，郴州

警方抽调170余名民警，派出32个外调组，辗转10余个省份，最终将所有涉案飞手和无人机核查到位。

在教育惩戒中遏制“黑飞”

“主要为了证明是他发的视频，是他使用的无人机。”方晓亮告诉记者，相较传统案件的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固定取证的电子证据多，数据流交错复杂，易灭失。李某某案中，警方跨越6个省市，就是为了确保证据链完整。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一个核心问题浮现：此类行为应如何定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情节严重的‘黑飞’行为明确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郴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刘杨解释称，未实名登记飞行，在禁飞区飞行，超高飞行等行为均属“黑飞”范畴。对情节较轻的“黑飞”行为，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或《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进行行政处罚。但此案中，行为的性质与潜在危害发生了质变。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危险性相当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天武指出，该罪是危险犯，构成犯罪不要求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他分析认为，李某某未经批准操控无人机在民航航线上超高飞行的行为“足以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符合该罪构成要件”，这与警方“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判断一致。

“车在路上跑，需要规则；无人机在天上飞，也是一样的。”周鹏将无人机管理类比交通治理，“比如违停，第一次可以柔性执法说服教育，第二次再处罚。无人机治理也需要在教育、惩戒中取得平衡。”

而产业链的终端，是那些追求“飞行自由”的无人机爱好者，其中不乏影视拍摄团队。

低空飞行不能逾越法律红线

历经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这一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布。随后，侦查人员兵分多路，奔赴黑龙江、北京、广东等多地，成功抓获李某某、王某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而这起案件的复杂之处，不仅在于涉案地域广泛，更在于团伙非法服务的传播与运作模式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性。代理商在多个社交平台、无人机爱好者社群同步发布宣传内容，客户群体遍布全国；团伙成员之间通过社交软件联络，交易通过线上转账完成，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给案件侦查和证据固定带来了挑战。

“我们需要梳理海量电子数据，才能准确认定每个人的犯罪情节。”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官毛伟玮介绍说，审查过程中，办案人员通过比对资金往来，核实飞行记录，最终精准锁定了各嫌疑人的作案次数和违法所得。2023年12月，海曙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因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王某等4名代理商作为共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加强综合治理，引导未成年人用好互联网，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清朗的网络空间。

李道峰说，最高法在办理工作中，就未成年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现象涉及的法律问题、裁判规则，已开展的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说明。

“最高法在建议办理过程中不是普法式地答复，而是真诚地听取我提出的意见建议，研究探讨我反映的问题。”李道峰说，在他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最高法专程来进一步听取意见，真正将代表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两制机制”落到实处。

对于最高法在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中的特色和亮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委员案建议办理局局长李孝芳说，2025年代表法修改后，最高法把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代表法融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具体体现实地体现在高质量代表建议中。

“最高法历来高度重视代表工作，扎实办理代表建议。”李孝芳说，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交由最高法办理的有469件。大会闭幕后，最高法及时召开交办会对做好建议办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所有主办、独办、分办建议答复均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审批；最高法加强组织协调，深化沟通联络，真诚凝聚共识，紧扣重点工作，注重成果转化，切实通过建议办理，将体现人民意志、凝聚人民智慧，保障人民权益，接受人民监督落实到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了代表们的充分肯定。

本报北京2月5日讯

□ 张晨

“吓死我了，无人机和飞机飞得一样高……”

近日，一位演员在社交媒体透露的无人机“黑飞”事件有了新进展。涉事人员已被警方抓获，“黑飞”至8000米的广东中山李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批准逮捕；为其提供破解技术的湖南资兴朱某某，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过程中。

该演员的呼吁，源自一位网路大V发布的视频，视频显示，在广东英德、中山以及湖南资兴等地，存在多起无人机违规定高空飞行行为。中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空域繁忙。民航专家指出，在相对速度下，即便轻型小型无人机也足以对高速飞行的客机造成灾难性后果。

近年来，无人机“黑飞”引发的安全事件屡见不鲜，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2025年12月以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严厉打击超“黑飞”违法犯罪“净空”专项工作，严厉惩处无人机“黑飞”行为。各地公安机关闻令而动，集中力量，全力加强安全防控和违法犯罪打击查处工作。中山李某某和资兴朱某某的案例向社会警示，为看一眼云任性“黑飞”，可能付出捅破“天”的代价。当个人好奇撞上安全红线，其性质已从违法滑向犯罪深渊。

无安全，不低空。无人机“穿云”的画面或许在视频中显得震撼甚至炫酷，但在现实空域中，却是悬在公共安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类案件的难点与突破，在于如何用法律武器精准打击这种新型安全威胁。正如公安部所言，取证之难，在于需将电子数据与现实的危害行为严密对应，证明“是他发的视频，是他飞的无人机”，定性之惑，在于界定限高、“黑飞”行为的罪与非罪。法学学者认为，行为明知法律规范严禁超高空飞行，明知其行为可能危及航班安全，仍利用技术手段破解限制、执意为之，主观上存在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客观上其行为已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这一判断，不仅针对本案犯罪嫌疑人，更是对潜在效仿者最严厉的警示：刑法的“高压线”，已明确架设到了苍穹之上。

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当前，“低空经济”已被写入国家发展战略，无人机在物流、测绘、农业、救援等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之两翼。此次案件的查处，告诫所有从业者与爱好者：技术可以飞跃云端，但行为必须恪守法律；创意可以翱翔天际，但安全底线不容触碰。